

“新人”的诞生：论延安文学范式的形成

刘东玲

【摘要】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延安文学范式的形成具有权威的指导性。但延安文学范式并非仅止于文学形式建构，它实际上是中共抗战建国战略的一部分，是应时应地的中共“延安道路”形成的具体策略的体现。延安文学范式的完成，是多元因素的合力。延安根据地树立的模范人物与英雄人物，是延安文学范式中“新人”的现实来源。延安文学范式的形成，是讲话精神与延安社会现实政治的积极互动：一方面“讲话”与整风确立了延安知识分子体制化的制度要求，另一方面这些客观现实倒逼着延安知识分子体制化的过程。延安作家力图实践“工农兵文学”的方向，从模范人物到新人形象，呈现出从制度创造到文学反映的完成过程。延安社会新意识形态的建构也完成了从政治实践到象征生产的过程。

【关键词】延安道路；延安文学范式；整风；新人

【作者简介】刘东玲，江苏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江苏 徐州 221116）。

【原文出处】《学术月刊》（沪），2022.10.144～155

何为知识分子？文化学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是运用思想来思考社会问题并对特定社会困境做出应对和选择的人们。因此，延安知识分子在延安战时的选择是与延安社会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的，当他们置身于“讲话”前后的社会氛围，面对不同的社会问题，作为知识分子的延安作家显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讲话”前统一战线是主导，“讲话”后阶级问题是主导。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指出：“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①从这个角度来说，延安知识分子在“讲话”前后文风的变化，以及延安文学范式的建立，都与当时延安社会的“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战时延安复杂的政治实践对延安文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政治设置就像制度性的设置一样，产生于某一环境中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因素”。^②战时延安统一战线政策与阶级斗争混杂的意识构成客观上造成了这一时期形势的复杂性，因此对战时延安社会政治建构的复杂情况进行考察，将有助于解释延安知识分子与延安文学范式之间的同构性。

延安道路——新意识形态社会的建构

马克·赛尔登在《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中用“延安道路”，特指中国共产党在1937—1945年间，将土地改革的进程与战时的统一战线政策协调在一起，创造性地解决了农村的压迫和解放问题的运动。他指出1941—1942年的整风运动具有分水岭般的重要性，使战争和革命事业获得了新的综合点。“延安道路”正是在战时形成并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定型的。“延安道路”是关于经济发展、社会改造和人民战争的别具一格的方式，其特征包括民众参与、简政放权、社区自治等。

抗战伊始，中共倡导建立抗日统一战线，1937年春中共中央建立陕甘宁边区时，共产党在陕北和陕甘边界25个县是活跃的，且土地革命在中心区15个县已经完成。“土地革命”意味着农民被革命思想所唤醒，出现新领导的阶段。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在陕甘宁建立政府的“新民主制度”，着手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改革之策略。需要说明的是，在战时情况下，陕甘宁在战时根据地里中享有相对稳定的局面，未处在敌人优势兵力之下，因此有条件进行

各项政治经济计划。5月制定出《陕甘宁边区选举法》，确定了乡—区—县—边区的四级选举程序，采用“直接无记名平等普选制”：“陕甘宁1937年春实行的选举和行政机构改革不仅对根据地内部具有重要意义，还含有全国和国际意义。普选迎合了国民党内外共和政府支持者的意愿。”^③1940年2月15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布，“实际上吹响了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公开与国民党争取领导权，排斥资产阶级的影响与作用，全力引导中国迈向社会主义前途的号角”。^④因此，延安边区抗日根据地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围绕这一目标，加强了对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工作。3月，毛泽东开始系统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手段，建立“三三制”的战时政策原则，使统一战线正式化和扩大化。“它代表最重要的一步是扩大各界的支持和利用他们的行政和领导技巧。……陕甘宁和其他根据地的‘三三制’有助于统一和加强行政，并使共产党声称代表全国有法律依据。”^⑤

1941年—1942年，面对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封锁带来的巨大困难，边区经济出现通货膨胀，“中共在1939年—1941年间大幅度调高税率，既是应付边区政府庞大的行政开支和各类项目的开支，也是为了应对国民党封锁带来的困难”。^⑥1940年1月26日，边区政府公布了税收条例，“征收范围包括食盐、牲畜(牛羊驴骡骆驼马猪鸡鸭等)皮毛药材动植物油蜂蜜烟草酒类迷信品等，税收条例施行不久，因各地反映税目繁多，税率较重，于5月30日废除了一月份的税收条例，颁布了新的《陕甘宁边区货物税暂行条例》”。^⑦但很多摊派加重了民众的负担，1941年6月15日发布的《中央对于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的意见》指出：“以一百三十多万人口要负担八万人的用度，负担是很重的。但不管人民负担轻重，八万人的用度，除政府部队和党自己生产自给部分外，边区党和政府应努力领导人民来担负这个责任，边区人民为自

己，同时也为全国，应当担负这个责任。”^⑧“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对税收的意义不大了解，划不清边区政府征税和过去国民党苛捐杂税的原则区别，抵触情绪很大。”^⑨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农民和边区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信仰不同的干部之间的关系都紧张起来，这对中共的政治纲领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自从1937年实行统一战线政策以来，很多并不支持农村革命的人们涌入中共的队伍，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边区。在1941—1942年期间，这些问题成为整风运动争论的焦点”。^⑩客观上这一时期延安社会面临着严峻的现实困难，因此现实情况的变化，尤其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冲突上升，中共需要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改变这些不利的局面。

1942年起，中国共产党采取激进的方针治理根据地，形成了后来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程序。经济方面，1941年后中共开始纠正乱摊派的情况，1942年之后，危机得以缓解，1943年推行的减税政策使穷人的负担降了下来，这时中共的政策已经向穷人的利益倾斜；政治方面，1941年春中共开展了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目标在于建立一个在思想方法和方向等方面高度一致的统一政党。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共发起了史无前例的干部教育运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环境中，为解决党和干部在过去和目前所遇到的问题提供了准则。斯图亚特·斯拉姆认为：“整风运动旨在协调个人的‘自觉行动’和完美的社会纪律之间的冲突。”^⑪沙培德也肯定：整风使“短期内，被更为强大的敌人所包围的共产党人创造出了一场致力于艰苦奋斗、自我牺牲与信仰来度过难关的运动”^⑫。1942年10月19日—1943年1月14日在延安举行“高干会议”，体现了党、政、军最高层的整风过程。会议涉及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是强调党的首要地位，其重要的一面是强调农民参与并削弱官僚机器的独立性与权力。中共制定了包括“群众路线”的新政策，采用新的方法解决农村社会中出现的新问题。整风与群众路线以继续推

进共产主义运动为指向,与之前温和的统一战线政策相比有了巨大的转变。

“延安道路”体现着中国革命对人民战争、革命和农村社会改造做出的最突出最富有特色的贡献。^⑮这一时期的中共政策,阶级革命居于主导地位,整风对完成政策转化意义重大。“整风运动和群众路线所要求的是一种新的领导办法。……新的领导要将农民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即增加生产并改变农村社会基层的权力结构。”^⑯这种政策变化实则是共产主义革命内在驱动力因时因地的变化结果,整风运动是中共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内在驱动力:一是精英主义倾向,指向理性化的等级秩序或集权化的组织体制;一是民粹主义倾向,强调依靠觉悟的农民大众。”^⑰延安及根据地以乡村社会为主导,需要发动群众参与生产及战争动员的迫切性,同时在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斗争中,人们意识到具有献身精神的党和技术精英所组成的理性的官僚阶层,不足以打破乡村贫困和压迫的循环圈,自上而下的革命不能使农民进入现代世界,乡村社会的根本性动力必须来自乡村内部。这正是中共制定群众路线的要义所在,以运动的方式对理性的官僚行政进行改造。显然战时延安社会面临的内外交困的处境都急需采取适宜的政策来扭转危机。延安作家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形势条件下,被纳入了延安政治制度的建构中,他们的身份、创作观、文学表现形式都因此发生了巨变。

延安社会的新气象——劳动模范与“新人”

1938年10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方面加强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边区经济政策不得不从争取外援休养民力转向自力更生。1939年春,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号召生产运动,动员各机关部队学校参加开荒运动。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标志着边区大生产运动兴起。会议提出奖励劳动英雄动议,并在随后的大生产运动中发现和创造了大量劳动英雄。

“劳动英模”是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简称,劳动英雄主要是生产运动的产物,模范工作者则主要是整风运动的产物。这一活动在1938年仍属小范围的临时性措施,但在1943-1944年则掀起了劳模表彰大会的高潮。1941-1943年,边区政府发现并创造典型,在群众中宣传和推广,组织群众生产运动,收到显著效果,劳动模范由此被创造出来。“劳动英模评选活动是中共在根据地时期政权建设的基本内容,也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的新型组织形式。进一步说,劳动英模是创造和推广典型的运动,生产建设工作可以各种不同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展开,而劳动英模运动则是非常有效的一种。”^⑱

1943年3月26日,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表彰了二百余位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这种盛会也是延安新意识形态建构的方式,通过表彰时代模范与英雄人物,将延安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宣传统一起来,同时,在经济建设中树立模范带头人,更能发动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这种表彰形式还迅速被制度化,边区政府发布相关命令将之常态化:1943年4月,边区政府发布《为奖励劳动英雄的命令》,10月,公布了《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选举办法》,边区政府召集全边区劳动英模代表大会。1943年11月26日,边区首届劳动英模大会与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在延安开幕,29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全体代表招待会,12月9日,毛泽东在参观生产展览会后邀请吴满有、申长林等17位劳动英雄座谈。1944年,边区政府颁布《为令各专员各县市长调查历年来农业生产中的劳动英雄予以奖励》的决定。5月1日,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大会奖励了李强等8名特等及73名甲等劳动英雄;6月27日,边区政府又召开合作社主任联席会议,会议奖励了刘建章等94名合作社英雄。7月18日,边区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作出《关于召开劳动英雄

模范工作者大会及生产展览会的决定》，肯定1943年劳模大会及生产展览会的作用，使劳动模范大会这一形式常规化和制度化。

更重要的是，劳动英雄与模范来自群众又高于群众的特点，便于发挥党的群众路线，达到更好地深入群众并鼓动和教育群众的目的；同时又是创造性地运用群众路线的方式。并且，劳动英雄表彰大会以新的时代嘉年华的形式，营造狂欢节氛围，军民一体，延安社会统一的景象，作为延安政权建设成果展览的象征形式，这种表彰大会的形式成为新的国家建设的形式之一。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不可忽视中共对群众的教育运动，劳动英模运动作为仪式化生产形式，具有双重效果，一方面根据地加强和深入了与地方社会普通民众的联系，另一方面，通过表彰英模，沟通了政权与地方基层管理的实践关系。劳动英模的模范作用为根据地和边区提供了新的教导性影响，典型人物英雄化和先进化也成为中共的一项重要重要政治仪式。

延安的社会改造运动除了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外，还包括精兵简政、减租减息、“下乡”运动^①、合作运动、互助与农业发展运动^②、大众教育运动^③等。延安的政权建设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使延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延安政权建设的各项措施改变了边区的面貌，农民在经济上翻身解放，踊跃入伍，他们中的积极分子成为乡村基层政权的核心人物。延安知识分子热情讴歌延安社会出现的新气象，他们通过描写和记述留下了特殊的时代印记：例如海陵的《人选对了！——从第三行政组看新市乡选举》一文记录了第三行政组市民选举代表的过程；戴邦的《陈圩冬学头一天》记述陈圩冬学开课第一天的景象；黄钢的《战场上的后花园》则描绘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群众戏剧运动的景象，并进行了热情的赞美：“我曾经多番多次的，设身为乡村演剧的看客，在这战场上。……这剧场，是奇特的海，革命的波浪造成的。有了它的潮汐与澎湃，乡村改变了乡村的风

格，近世纪的文明，将半封建的习俗冲淡了。”^④野蕨的《山水人物》通过对边区印象的描摹展现时代新变化：查路条的老头，和平与安全的田园与乡村景象，正在上课的妇女识字组，儿童团的歌声，民选的区长构成的区政府，17岁的妇联分会主任，土屋里织麻的泼辣农妇，帮农民收割的八路军士兵，曾经是赤卫队长的现合作社主任等，这是被战争与革命改变的村庄的新景象。鲁黎的《秋天·乡村特写》中这样描述获得新生的思想进步的农民——“在这小小的村庄里，涌现出一批全新的人物来，这些人在这次运动中最宝贵的斗争果实。从前谁知道他们，他们被旧社会的统治者踢在角落里。现在他们出来了，带着崭新的面貌，新的气派，新社会主人的感觉。”^⑤绉弩在他的《巨像》一文表达置身于民众中的幸福感与存在感：“可是今天，我多么高兴啊，从那些农妇们，女兵们，学兵，战士，壮丁们那里，突然发现了我自己！我和他们在一块儿工作，我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从他们身上，可以找到我的心和手的直接和间接的痕迹。我再不是一个孤独的个体，我和世界和人类是一起的：尤其是和这些为祖国争生存争自由的人们，抢救着祖国的每一块失去的土地的人们，创造新中国，新人类的人们是一起的！……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在人们中间，虽然我是这么渺小，我的力量是这么微弱。……一时又觉得自己是如此地伟大，崇高：幻想我是一尊人类英雄的巨像，昂然地耸立云端，为万群所瞻仰。过去的我，却匍匐在我的面前，用口唇吻我的脚趾，感激的热泪滴在我的脚背上。”^⑥

延安的政权建设，使广大农民积极参与到边区建设中，获得了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尤其是模范人物作为无产阶级先驱人物的现实典型，昭示着新的时代氛围的巨大变化。“在1942年后随着大生产和变工互助等运动的开展，以贫苦农民为基本形象的生产能手和劳动模范大量涌现出来，改变了群众对‘领袖’的认识以及现有干部队伍构成。……总之，中共

通过对基层政权改造产生了一支新的干部队伍,他们是中共改天换地最基本的依靠力量,是中共建设事业最主要的承担者。这些新生干部大多是来自社会底层的贫苦农民,他们在中共扶植下进入权力层,其职权和权威源于中共赋予并因自身经济能力和文化资源匮乏而对中共依赖性极强。”²³

这些运动中创造出的劳动模范和英雄模范,他们成为延安社会“新人”的真实典型。“新人”形象源自“共产主义新人”的概念:“在1942年和1943年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中,形成了共产主义新人的新观念。这种理想中的人超越了专业与地位的界限,集劳动者、领袖、战士和学生于一身。这些品质体现在地方积极分子身上。”²⁴实际上,在小说塑造的“新人”形象出现之前,在延安以及各根据地社会的现实政治经济生活中,这些被创造出来的“时代英雄”,他们的事迹在大会上被表彰鼓励,负责宣传事务的文化干事们也对其事迹进行报道,构成延安政治宣传的特定内容。由这些事实可见,延安文学中的“新人”形象并非源于虚构,他们的原型来自这些现实中的劳模或英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劳动模范和英雄人物还成为了解放区纪实性文学作品的主人公或人物形象,几乎以原型方式在纪实性文学作品中,并在之后虚构的叙事文体尤其是小说形式中发展为文学形象。这些“新人”形象延续到“十七年文学”中,又被称为“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这种与现实人物同构的“新人”形象,是“社会主义新人”的最早形态。

延安知识分子的体制化与文学的制度化

抗战爆发后,陕甘宁未处于优势敌军压境之下,在整个战争期间是免于日军进攻的避难所,加之延安社会营造出的模范抗日根据地景象,吸引了大量青年和知识分子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这些知识分子到达延安之后,无不为延安新鲜的空气所奋兴;而在1942年前,延安对知识分子也极尽优待,延安为到来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各种较为便利的条件,如大量文艺团体的建立,以及为解决娱乐匮乏的问题建立的延安文化俱乐部(1939年冬),众多刊物的创办等;

知识分子依托各机构、团体和组织,主要为文化单位开展工作,教育和研究机构也成为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因此从客观情况来看,在1942年延安讲话发表前,延安对知识分子的管理还处于松散的自由主义状态中。

延安知识分子在感性层面对延安民主自由的氛围颇为赞赏,这种氛围带给知识分子的归属感,主观上使他们迅速融入了延安社会结构,延安社会战时共产主义浪漫氛围无疑也制造了知识分子对延安的浪漫想象。这种自由宽容的氛围某种程度上也受战时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因此在这种氛围中,延安知识分子的写作,经历了初入延安的抒情,到延安生活日常化时转向对延安社会生活进行批评的启蒙写作阶段。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启蒙的立场本质上是对延安社会生活经验的理性审视,并没有跳脱延安这一时期宽松的意识形态氛围。

这些来到延安从事写作的知识分子,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1930年代即已接受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左翼知识分子,还有一类是因战时动荡追慕延安氛围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后一类知识分子显然缺乏革命经验,并普遍对革命抱有浪漫主义和乌托邦的想象;但对知识分子总体来说,他们从新文学承继的启蒙传统是相似的,奔赴延安的左翼知识分子虽然对革命意识形态有认同感,但他们与中共之间更像是合作的关系,而非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加之统一战线主导时期,延安热情吸纳知识分子的需要客观上也延续了左联时期知识分子相对自由的写作状态。此一状态一直延续到1942年。以整风运动为开端,延安政权开始建构政治上的统一与团结,知识分子被纳入延安政权的组织与系统中,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被置于阶级革命的框架中确定其阶级属性与功能性。

卡尔·曼海姆将知识分子称为“漂移的知识阶层”,这个阶层的价值立场取决于他们所在的意识形态社会结构。他指出:“知识阶层是一个存在于阶级之间、而不是阶级之上的集合体。知识阶层的个体

成员可能会,并经常会有特定的阶级取向,在实际的冲突中他会站在某个政治派别一边。……并体现出清晰的阶级位置的特征。”^⑤但同时他也指出,知识分子由于受到特定的知识训练,使他们有可能从多种视角看待当时的问题,这种倾向有时会与其阶级利益相冲突。因此初到延安的革命知识分子,一方面有明确的阶级位置,即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认同,但同时他们的知识素养,尤其是新文学的启蒙精神与左翼政治批判立场为他们审视延安社会提供了多元视角,此外统一战线的宽松政治氛围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构想中,知识分子的能力就在于职员和附属,马克思主义预设了知识分子的这种从属性:“当分散的知识阶层群体开始发现其社会地位时,他们就在无产阶级为自己营造的框架中理解自己。这就能解释知识阶层突然降低的自尊,原先的自负现在让位于屈从。”^⑥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社会结构中知识分子的从属性的这种定性,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将其制度化,理论与实践均受苏联社会主义影响极深的延安政治继承这一特性并加以本土化。尤其重要的是,在延安无产阶级政权建构的现实条件下,大量人民群众获得主体性的客观现实,使作为意识形态生产者的延安知识分子面临新的时代任务。

延安政权建设的本质是实现建立民族国家的目标,“要让国家存在,被支配者就必须服从权力宣称它所具有的权威”。^⑦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说,延安激进的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知识分子在阶级社会构成中居于从属地位,毛泽东延安讲话提出的“向工农兵立场”转变的指示,包含着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理性内涵,同时也是延安政治文化的现实要求,这双重的规定性通过学习讲话及文艺界整风,确立了其现实的权威性,客观上向延安知识分子提出了新要求。与此同时,毛泽东个人对知识分子的功能定位和他对知识概念的解释,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知识分子在延安社会结构中的定位。毛泽东1941年5月在

《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矛头直指党内的知识分子;他批评主观主义,严厉指出其危害性——“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⑧1942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文章特别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⑨将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上升到组织问题与政治问题,其严重性不言而喻,在这种形势下,以批判性言论获得革命身份认同的延安知识分子面临转换风格的问题。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反映了延安政权在新时代对知识分子提出的新要求。毛泽东强调:“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⑩毛泽东对知识概念进行了解释,认为知识只有两种:生产斗争知识与阶级斗争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归属于阶级斗争知识范围内,由此他认为没有实践知识的人不能算是知识分子,至少其知识是不完全的。这样的知识解释打击了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他们需要借助工农群众实践才能确立他们的地位与价值——“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⑪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取决于向具有生产性经验知识的民众学习和改造的程度,取决于他们表现新意识形态的象征生产的能力。

整风运动的目的是实现政治上的团结与统一,因此延安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显然成为需要整顿的

问题。毛泽东在谈到宗派主义问题时,特别强调应该遵守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他严厉指出:“必须将各种不统一的现象完全除去。”^⑧他批评那些与党闹独立性的人往往是个人第一主义的人,在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上是不正确的。显然,在以思想统一和团结为宗旨的全局观下,整风前文艺界过于宽松自由的现象就是宗派主义的表现,严厉的组织原则确立了新意识形态的权威性,知识分子应以服从组织作为第一要义。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指出:“无产阶级经常把某些不十分彻底的、不完全是纯粹马克思主义的、不十分正确的分子或流派吸收到自己党内来,但也经常地定期地‘清洗’自己的党。”^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观来源于列宁的观点,毛泽东提出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才能使犯错误的同志最终克服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毛病,整风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正是他创造性地运用列宁这一观念的体现。群众路线作为知识分子改造与实践的方式,也发挥着重要作用,1943年5月,自中央文委、中央组织部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后,延安文艺工作者纷纷下乡,为实践“工农兵文学”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延安新意识形态的政权建构向延安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与存在价值提出了新的标准,立场不仅仅是思想问题,更是政治问题,而且这一立场问题与意识形态的象征生产是一体的,即“讲话”不仅仅是关于知识分子思想立场的问题,更是文学的象征生产的问题。文学首要的任务是为现实政治服务,这涉及如何具体书写“工农兵”,塑造“新人”形象,表现新意识形态。换言之,延安政治客观上需要制度性的文学象征生产,因此,延安知识分子经历了整风、学习到审干、下乡等运动后,迅速完成了组织身份的转变。从整风到下乡作为制度性的安排也强化了知识分子改造的规定性,他们从作家向文艺工作者身份的变化,反映了这些知识分子成为体制内知识分子的有机化过程。

同时,另一不可忽视的现实因素是,延安及根据地新的政治气象、新的时代人物,急需作为象征生产的文学将之具象化,完成意识形态的象征生产,作为政治表征的文学才得以完成。从马克思的唯物论来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延安社会形态已然发生巨大变化,象征生产却呈现出滞后状态,因此作为延安意识形态体现的新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缺位与滞后,倒逼着延安知识分子迅速跟进时代新气象。这种文学生产的急迫性和必要性,即延安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政权与制度建设)与延安社会现实(劳动模范人物),对延安知识分子构成了双重压力。自30年代以来以政治意识形态鼓动和社会批判性写作为特征的左翼知识分子,其精英地位受到了现实的考验;知识分子思想滞后于延安新意识形态的状态,更加剧了以无产阶级革命为政治信仰的延安知识分子精神心理的愧疚感,他们真诚地进行自我反思,端正和提高思想认识,以期完成延安新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提出的新任务。

“讲话”后,延安知识分子纷纷表达学习“讲话”的体会,通过痛切的反省表达转变态度的态度。艾思奇在《谈延安文艺工作的立场、态度和任务》中指出:“文艺服从于政治,前进的文艺,是革命的政治事业之一部分。表面上挂着自由招牌的反动艺术家,对这一点是坚决反对的。”^⑩这成为知识分子反思的思想基准。周立波痛切地反省:“我们是从旧世界来,还带着许多思想上的毛病。对于我们,思想的改造,立场的确定是最要紧的事。”^⑪丁玲则痛彻心扉地表示:“是的,我承认我们今天的技术修养还不够好,我们还要好好加强文艺的学习,可是今天应该强调立场。……立场不能解决艺术以内的一切问题,但它解决主要问题。”^⑫艾青为讲话后创刊的《街头诗》写下:“劳动者是文化的创造人;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文化从特权阶级夺回来,交还给劳动者,使它永远为劳动者所有。……诗人应当毫无间断地关心老百姓,倾听老百姓的话,注意老百姓的事情,留心发生在老百姓之间的每个新的事件,只有这样,才能

使诗的内容与形式日益丰富与扩大,才能使诗富有生命。”^⑧何其芳在《朱总司令的话》中发表他对朱德发言的领会:“我们到延安,在延安工作,还不过是在政治上从另一阶级到这一阶级罢了,我们还要在思想上抛弃那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才是真正的完全缴械。”^⑨丁玲在《纪念瞿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中,从瞿秋白在30年代初的“大众化”理念谈起,自我反省道:“我在他的影响和鼓励之下,曾努力去创作,努力从各方面去尝试,但距在延安读毛主席文艺座谈会文艺讲话时是十年了。十年之后我才认识我那时并没有真正了解瞿秋白同志的文章。我才明白我还需要‘挖心’,我很难受我脱胎换骨之难。”^⑩丁玲的反省折射出左翼知识分子对“化大众”和“大众化”的认识,即“漂移的知识阶层”由于根据地群众成为无产阶级主体而需要重新寻找定位,即从启蒙大众的“化大众”向“工农兵”学习的“大众化”的全新认识,延安大众翻身解放的新现实要求知识分子“大众化”的新要求。

基于政治身份认同的迫切要求,延安知识分子以讲话精神反思自我,克服主观性和个人主义的思想问题,努力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1942年前延安的启蒙文学被冠之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甚至被定性为反动的文艺,其严厉程度显然使正在学习改造的延安知识分子格外紧张,他们难以背负如此严重的指控,需要在整风学习中接受意识形态的规训,明确自己的态度。“总体而言,1942到1944年的整风运动将强制与救赎结合起来。”^⑪加之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本质上是追求政治信仰崇尚行动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纯粹的文学创作并无兴趣,文学只是他们寻求社会改造的途径和方式,他们需要协调的是个人与组织纪律的问题。延安讲话作为延安文学精神的指导,为延安文学范式的建构提供了启示。对于讲话后的延安知识分子,他们表达整风学习的体会,到下乡实践并创作新意识形态的文学——大众化、民族化的“工农兵文学”,正是建构他们延安知识分子身份合法性的必需。“身份……

通过实施,通过行为而存在,也就是利用众多话语工具通过实践来建构的,这些话语工具可以叫做‘身份技术’。”^⑫这些行为与“工农兵文学”话语均是身份建构的实践。

延安知识分子在新的创作观的指导下,在整风学习与下乡实践中,努力向写作“工农兵文学”的文艺工作者身份转变。因此,作为肩负延安社会意识形态象征生产任务的延安知识分子,面临把握新意识形态和创造新的人民的文学的迫切性:无产阶级群众完成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的升华,政治启蒙让位于理解现实与学习新人,左翼知识分子政治批判与阶级压迫式的写作需要被扬弃,新的现实要求文学书写新意识形态下的新社会与新的时代人物,这一新的质变无疑需要新的表现形式。延安知识分子在现实环境中面临着新挑战,他们纷纷在下乡运动中,获取新的素材,努力实践“大众化”“民族化”的方向,并表达着对新现实的认识与体会:黄钢在《平静早已过去了——延安鲁艺整顿学风的辩论》中表示:“方向,路,艺术工作者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和实际斗争有游离?路线是不是对的?人们在审查,对他自己,并且也对自己所属的这一个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艺术革命为光荣任务的教育团体。”^⑬茅盾在《记鲁迅艺术学院》一文中归纳鲁艺青年学生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一个信念,娴习文艺这一武器的理论与实践,为民族之自由解放而服务”。^⑭在“讲话”后奔赴各个乡村的鲁艺宣传队,更是在基层实践着“工农兵文学”,他们以民间秧歌舞的形式,或进行政策宣传,或进行大生产的鼓动,引起了群众的极大兴趣,完成了寓教于乐的任务。黄钢称赞“鲁艺宣传队认为它这次工作,是向着新的艺术活动方向的新的开始,新的出发”。^⑮这些表达无疑是真诚的,对延安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政治信仰的追求本质上是期望改变劳苦大众苦难的生存状态,工农大众翻身解放的现实无疑是鼓舞人心的。正如康濯在《恨和爱》(《晋察冀日报》1946年10月2日)中所说:“近来,在我们解放区的农村,农民从清算复仇翻身的斗争中得到

土地之后,他们对共产党毛主席的信仰和拥护,那实在是语言文字中很难找到确切词句说明的。”^⑤

“新人”形象——从纪实到创造

延安讲话后,知识分子在制度性的下乡实践中,贴近了现实与人民群众;对于作家来说,进行“工农兵文学”或“新的人民的文学”的象征生产才是他们的责任与义务;另一方面,文学风格转换并非有了精神指导与下乡实践即可形成,它更需要了解群众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对民间文化的习得,这都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实现的;但延安作家急需以象征生产证明其身份合法性,这种迫切性使他们在创作初期大多选取现实生活的英雄或模范人物作为原型,进行新意识形态的写作。

1943年延安知识分子纷纷开始了下乡的实践,但新意识形态的作品尚付阙如。需要指出的是,在“新人”这一文艺形象在小说等虚构性文体中出现之前,“新人”形象多在报告文学、散文等纪实性文体中以纪实形式得以呈现。在这些作品中,叙述事件与塑造的“新人”形象与原型大多一致,这是“新人”形象表现的第一个阶段:如曾克写作的大量报告文学作品,他的《劳动的妇女们》记述了梁峪村积极开展纺织工作的农村妇女们,她们作为抗属负责全村的生产和抗勤工作,参加互助组,呈现出积极进步的精神面貌——这是民主政权下得到解放的妇女形象;《郭维德创造调解模范村》记录了一个模范村主任郭维德以平和的方式调解村里的人事矛盾并将村里的事务开展得有声有色的事迹;《典狱长党鸿魁》记述延安边区模范典狱长党鸿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发动犯人参与到思想改造与劳动中的事迹;《杜忠才》则记述了边区的劳动模范杜忠才的事迹。此外如林风的《一架机器的诞生》记述了延安被封锁时,无线电制造厂的工人和干部们克服各种劣势,终于造出了无线电发报机的事迹;吴伯箫的《丰饶的战斗在南泥湾》则记述了战士们在南泥湾的开荒事迹,歌颂了自力更生的南泥湾精神;徐刚的《共产党员的本色》记述了鲁中区劳动模范陈善的英雄事迹;寒影的

《农民英雄高凤魁》记述了农民高凤魁与地主李茂竹不屈不挠作斗争,并走向进步的事迹;丁玲的报告文学作品《田宝霖》记述靖边区合作社主任——劳动模范田宝霖的事迹;艾青的《汪庭有和他的歌》记述农民歌手汪庭有在翻身前后巨大的变化,八路军的到来改变了汪的命运,使他从一个愁苦多病的农民转变为快乐勤劳的歌手;荒煤的《模范党员申长林》记述了劳动模范申长林的事迹。这些作品大多以现实生活中的劳动模范或英雄人物为原型,记述了他们成长为劳动模范或英雄的故事。

这些现实生活中的劳动模范或英雄人物,作为社会生活中的时代“新人”原型,成为文学创作中“新人”形象的基础和预备。这些纪实性的“新人”形象,更强调对根据地群众进行时事宣传和形势教育,大量作家涉笔这一文体也折射出作家身份认同的迫切性。刘白羽在《新的艺术新的群众》一文这样表述:“这些新的群众,新的英雄,不是今天一下子从平地里跳出来的,是在这些年斗争中间,一直在那里生长着,行动着,但在四二年以后才轟然以一种灿烂耀目的姿态出现在艺术作品里面,——这是毛泽东同志《文艺座谈会讲话》,分开了在这以前和以后显著的不同;他那有历史意义的讲话,将划分着中国文艺史上两个不同的阶段。”^⑥刘白羽的表达非常有代表性,延安讲话是促使延安知识分子意识到新的时代变化的重要因素,在新的现实下他们需要迫切地转换立场获得身份的合法性。

“新人”形象的第二个阶段,主要表现为:作家在非纪实文体中对现实生活中的原型人物进行加工与提炼,但人物形象保留了原型人物的真实性,包括其身份与事迹,这类创作主要以戏剧、小说与诗歌为主。

首先看戏剧方面,有1943年2月由延安鲁艺演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这是文艺整风后产生的第一部优秀秧歌剧),6月由冀中火线剧社创作并演出的大型话剧《王秀鸾》,此外如《李殿冰》《把眼光放远一点》(话剧)、《周子山》《城壕村》(大型秧歌剧)、《血泪仇》(秦腔剧)等大量戏剧。这些剧本多选取现实生

活题材,塑造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纪实性大于虚构性,强调用戏剧的形式鼓动和教育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刘白羽在看了秧歌剧后曾激赏:“我在延安看了很多次秧歌剧,我现在还时常想念那些剧中人物一英雄——他们的动作,他们的歌唱,都留给我极深的印象。他们是崭新的人物,带了他们自己的腔调和姿势,出现在秧歌剧中,而且把他们在战争里面,生活里面现实的光明内容表现得十分充足。这是一件大事情,这件事在说明着我们的文艺走进了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⑧

再看小说。孔厥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讲述了过去的童养媳现在的劳动模范折聚英的事迹;葛文的《新娘》讲述离婚的农妇二妮自己找婆家并热心劳动的故事;高朗亭的《雷老婆》通过“我”(战士)在有勇有谋的雷老婆的帮助和保护下安全脱险的故事;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讲述根据地进步农村青年栓柱与金凤自由恋爱的故事……这些小说大多以根据地“新人”为中心,注重故事性,以讲故事的方式反映根据地民众的新面貌,塑造新人形象。此外如郑笃的《情书》(1946年7月)、崔挺的《俊英》、秦兆阳的《老头刘满囤》(1948年秋)、白桦的《刘老爹的骡子》、荒草的《土地和枪》(1946年11月)等小说,或反映乡村女性的新变化,或记述农民翻身解放的喜悦,或反映农民参军入伍的热情,反映了解放区社会新人辈出的新现实和新面貌。

同时,还有大量的诗歌也以纪实性题材为写作的主要内容。艾青的长诗《吴满有》通过长篇叙事形式讲述劳动模范吴满有的事迹。艾青在学习讲话和下乡实践后就发感叹:“把诗和政治密切地结合起来,把诗贡献给新的主题和题材:团结抗战、保卫边区、军民合作、缴公粮、选举、救济灾民……整顿三风,劳动英雄,模范个人赵占魁……使人们在诗里能清楚地感到今天大众生活的脉搏。”^⑨这样的号召颇具代表性,这种纪实性的诗歌创作也颇有代表性。田间的《戎冠秀》记述了女劳动模范戎冠秀的成长;邵子男的《模范支部书记》同样以纪实性叙事为特

征;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讲述边区自卫军保卫边区的事迹;何其芳的《一个泥水匠的故事》也以真实人物故事为原型,反映边区农民的新变化。

总体而言,这些延安文学虚构性的文体,均表现出纪实性的特点。具体来说,这些纪实性表现为:第一,人物或事件多以纪实性为主,突出表现为对“新人”形象的塑造,这些“新人”形象都来自延安边区及其他根据地的社会生活,有原型人物,且在作品中,基本保留了原型人物的英雄或劳动事迹;同时,为便于群众理解小说多将真实事件故事化等。第二,诗歌的叙事化,这一时期,由于对意识形态表达的需要,诗歌强化了叙事成分,尤其是长篇叙事诗的涌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诗人获取的根据地现实的题材更合乎“工农兵文学”的需要,加之叙事更便于表达政治主题。第三,由于讲话后作家们在短时期内并不能消化自我的实践经验并将之艺术化,纪实是比较便捷且符合并满足现实写作的方式。这是讲话后延安文学创作中突出的特点,这些非纪实文体的纪实性的特点,反映出作家身份认同的迫切性,他们选择富有时代特色的事件与人物,便于在短时间内创作出符合新意识形态的作品,以写作行动履行作为文学工作者进行象征生产的义务。这些共性一方面折射出作家自觉向群众立场的转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家们谨慎的态度,选取客观的群众性题材,避免主观个人化的表达,对于经历了整风后的他们无疑是比较安全的选择。

“新人”形象的第三个阶段,则是在非纪实的文体中,在现实原型人物的基础上,进行再加工,塑造人物形象。这种再加工更注重塑造超越于原型人物的人物形象,人物形象与原型相比,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或者说,人物形象的艺术虚构更突出,出现了更具文学性的“新人”形象。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贺敬之等执笔创作的秧歌剧《白毛女》、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这些创作超越了照搬现实的初级、简单的写实性,更

突出艺术审美的真实性。举例来说,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这一“新人”形象,与原型人物——农村青年岳冬至因自由恋爱遭到村政权人物的打压致死的原型已相去甚远,赵树理创造性地塑造了“新人”小二黑的形象,将之塑造为敢于与乡村恶势力斗争并具有主体意识的新一代农民形象;《白毛女》则更具有创新性,将民间传说上升到揭示新意识形态主题、塑造新的民众主体的高度;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中的主人公王贵不仅是具有反抗意识的农民,亦是具有阶级主体意识的“新人”;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新人”形象张裕民、陈仁,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中的“新人”赵玉林和郭全海,更是面对复杂形势成长的“新人”。至此,以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形式作为表现特征的延安文学的范式得以完成。这几位作家是颇具代表性的:赵树理代表了来自乡村的革命知识分子,他对乡村经验的熟悉与对新意识形态的认同,经验性大于理性;贺敬之、李季代表了在根据地成长的新一代革命知识分子,他们大多由革命而走向写作,对意识形态的接受与理解是内生的;丁玲则代表了由左翼而转向新意识形态认同的知识分子,对他们来说,乡村经验与新意识形态均需要消化和学习,将之化为象征生产的要素,写作是实现身份合法性的文学实践的必由之路。

因此,“新人”形象的诞生,是多重合力的结果。延安讲话的权威性与指导性,延安边区及各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延安知识分子对讲话精神的学习及整风运动,以及讲话后开展的知识分子下乡运动和工农兵文学实践,这些因素缺一不可。“延安文学”是延安社会意识形态建构的结果,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表现与象征得以完成。在意识形态文学的结构中,作家的作用体现在对意识形态进行解释的文学生产中,亦即作家是意识形态写作的工具,意识形态自身有其理性内容,作家需要以文学表征的方式进行阐释。

结语

延安文学范式的建构,其标志性意义不可忽

视。它标志着延安知识分子创作经历的一次重要变化,折射出左翼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创作从30年代宽泛的意识形态批判走向规范的意识形态阐释的过程。延安文学有其自身的价值,它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文学的大众立场,反映了延安社会的崭新气象;它强化了文学对民间文化资源、大众形式的吸纳,在作家的努力实践下,实现了对民间资源的创造性转化,秧歌剧与民间叙事诗等独具特色的形式进入延安文艺的形式版图,丰富了现代文学的文体形式;同时,它为延安文艺贡献了“新人”形象的图谱,从真实的劳动模范到虚构的新人形象。这些变化无疑折射了延安社会的时代思潮与审美之变。

需要指出的是,延安文学固然确立了独特的政治审美价值;但同时由于其权威性,也排斥了其他文学形式与表现的可能。延安文学树立的意识形态阐释性写作,造成延安文学表现主题、人物形象及审美旨趣的单一化。延安文学在确立了其权威性的同时,也限制了文学进行其他探索的可能。

注释:

①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②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78页。

③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27页。

④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93页。

⑤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第167页。

⑥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第177页。

⑦星光、张扬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22—123页。

⑧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9页。

⑨星光、张扬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第127页。

⑩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第184页。

⑪转引自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第184—185页。

⑫沙培德:《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高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94页。

⑬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第173页。

⑭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第199页。

⑮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第204页。

⑯岳谦厚:《边区的革命(1937—1949)——华北及陕甘宁根据地社会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21页。

⑰这种新意义的下乡运动是在1942年春的整风运动发起的,特指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延安学习之后被派到农村去。参见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第216页。

⑱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高干会议上发表《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提出农村开展合作运动,会议结束后组织互助组成为转变农业生产的重要举措。1943年春耕以前,中共号召将互助作为农村经济的基本方式。参见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第231页。

⑲大众教育运动强调扫除文盲和传播经济生活的基本技能。1944年的口号为“发展生产,扩大办学”。新的学校是为工农大众半工半读设计的,包括夜校,半日学校,冬学和扫盲班,而且往往和工作单位直接挂钩。遵循民办公助,强调大众教育而非精英教育的原则。参见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第255页。

⑳雷加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散文杂文编》(二),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第982—983页。

㉑雷加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散文杂文编》(二),第1056页。

㉒雷加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散文杂文编》(二),第899页。

㉓岳谦厚:《边区的革命(1937—1949)——华北及陕甘宁根据地社会史论》,第51—52页。

㉔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第259—260页。

㉕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第173页。

㉖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第171页。

㉗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

者·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56页。

㉘《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7,800页。

㉙《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1页。

㉚《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5页。

㉛《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6页。

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1页。

㉝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70页。

㉞刘增杰、赵明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151页。

㉟刘增杰、赵明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第146页。

㊱刘增杰、赵明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第166—167页。

㊲刘增杰、赵明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艺运动资料》(上),第517—518页。

㊳黄钢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报告文学编》(二),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第1070页。

㊴雷加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散文杂文编》(二),第1167页。

㊵沙培德:《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高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97页。

㊶于连·沃尔夫莱:《批评关键词——文学与文化理论》,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3页。

㊷黄钢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报告文学编》(二),第1057页。

㊸黄钢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报告文学编》(二),第1048页。

㊹黄钢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报告文学编》(二),第1062页。

㊺黄钢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散文杂文编》(二),第1547页。

㊻刘增杰、赵明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艺运动资料》(上),第294页。

㊼刘增杰、赵明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艺运动资料》(上),第285页。

㊽刘增杰、赵明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艺运动资料》(上),第518页。